

近百

集

的經濟書的變化
國史詩集之一

吳晗

我們不妨

選集

家選集之一

拿前一世紀時

我們的祖父曾祖父而過的

社版

活。和我們這代人比較。我們知道前一世紀的人除了少數持刀外出穿

的是編織的科衣服。吃的是自種自度的米。此克明的是良田

之。高婢作。我扣銀子。帶在身邊。很累。交通二具。有錢的人。生

子或大車。沒錢的只好。從。到北平。走半年。鄉下人有一。這

過破的。更不用說遠。現。一百年後的現代人呢。大多數人穿的是外國天

洋布。更不用說遠。現。一百年後的現代人呢。大多數人穿的是外國天

西貢。更不用說遠。現。一百年後的現代人呢。大多數人穿的是外國天

這煤油。和黃電。也是從外國。交通二具。有電。汽車。火車。甚至

的。都是外國。從。到北平。走半年。鄉下人有一。這

大都是做。這有趣的對比。告訴我們一個。一世紀以前的人

吳

天津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吴 哈 选 集

苏双碧 王宏志 编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插页 33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201-00076-4/K·14

定 价： 7.25 元



吴 晗 像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以及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本丛书是由中国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编辑的。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为积累文化、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

编者前言

《吴晗选集》共收入二十七篇文章，所收文章尽可能反映吴晗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三十年代，吴晗著作的主要成就是考据文章；四十年代表现特色是战斗性很强的历史杂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著作涉及面比较广：杂文、史论、戏剧、伦理、历史知识普及都有。选编时已尽量照顾到这些特点。《朱元璋传》和《海瑞罢官》是两部有重大影响的传记和剧本，选集特地收入这两部著作的序言。《说道德》、《再说道德》体现了吴晗关于道德批判继承的思想观点，虽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却反映了吴晗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这两篇文章也收入其中。为保持文章发表时的原貌，文章按发表年代排列。所收入文章除改动个别错别字外，一律不作改动。为使读者对吴晗著作、生平有个大致了解，本书最后附有《吴晗著作和生平年表》一文。限于水平，编辑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87.5

序

吴晗（1909—1969年）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父亲吴瑛珏是前清秀才，善诗书，严于教子。吴晗七岁开始背诵《御批通鉴》，这部书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

吴晗中学毕业后，家境不济辍学，在家乡苦竹塘任小学教员。后来靠母亲变卖首饰和族人的支持考进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吴晗到上海考进中国公学，胡适是校长，因听胡适的课，吴晗写了《西汉经济状况》一文，得到胡适的赏识。1931年，吴晗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的关照下得到一个工读生的位置。在系主任蒋廷黻提议下，吴晗决定专攻明史。1934年毕业后，留清华史学系任教。抗战以后先后担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是著名的民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这里想对吴晗的历史观的转变和治学道路作些论述。

吴晗曾经说过，在三十年代，他的治学“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蒋廷黻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写信要吴晗“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吴晗回信表示要按胡适指点的“逐步做去”。在学生时代，吴晗的治学道路主要是师承胡适。他用力较深的几篇文章，如《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写作时代和社会背景》等等，

都是属于考据文章。但是必须指出，吴晗在学生时代的治学道路，也并非只受胡适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吴晗共写了近五十篇文章，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都是谈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属胡适传授的治学道路。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蒋廷黻是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兼重”，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蒋是吴晗的直接授课者，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引用原文。他的学风，很受吴晗欣赏。张只比吴晗大四岁，也没有给吴晗上过课，但他们却很要好，经常在一起交谈学术观点。进入四十年代以后，吴晗已认识到搞考据是“支离破碎”的史学，逐步摆脱胡适治学道路的束缚，转而写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历史文章，文风基本上和张荫麟提倡的是一致的。

三十年代，吴晗的考据文章是颇具功力的。从治学方法上看，是沿袭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但他的考据文章，又不完全受胡适所谓搞考证是为弄清一个词、或一个字的古义的束缚，而企图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这个时期吴晗的考证文章，大体上可分成两类：其一，是纯技术性的考证，如《胡应麟年谱》，纯是为解决胡应麟的存年而写的，而《〈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故事及其演变》一文，则主要是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他的考证方法，“恰

象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穷根究底，一直剥到笋心才肯甘休。再接着，他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这段话本来是吴晗用来概括罗尔纲的考证方法的。但罗尔纲认为吴晗自己的考证，正是采取这个方法的。也正因为这样，吴晗的这些纯技术性的考证文章，才比较有说服力。其二，是通过对某些问题的考证达到说明社会和解释社会的目的，甚至企图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向。例如《胡惟庸党案考》，是吴晗读《明史》时，发现关于胡惟庸党案记载歧异很多，许多材料不能自圆其说。吴晗查阅大量史料，并认真排比，终于把这个案子的始末弄得水落石出。通过考证，吴晗认为，“明太祖是有雄心的政治家，他不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权力，而胡惟庸也是野心勃勃的，有些事做了没有让明太祖知道，因而君臣之间矛盾加深，冲突终于不可避免。明太祖直接掌握着军队，于是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胡惟庸杀了。很明显，如果是胡惟庸造反被杀，杀了一个宰相，应当更立一个宰相。但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之后，却干脆取消宰相一职，相权收归皇帝自己掌握，“朱元璋一手独揽全国事务，这是一件大事，自秦汉以来，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没有相国、没有宰相的局面。”不设宰相，权力统归皇帝一人，说明到了明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加发展了。又如《〈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的考证内容，则涉及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文中有“佛教的盛衰和小令”一节，就这样写道：“《金瓶梅》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假如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压迫，在他的著作中决不能无中生有捏造

出这一个佛教流行的社会。”从而证明《金瓶梅》是成书于万历年间，因为那时正是佛教得势的时候，而绝不是成书于嘉靖年间，因为嘉靖一朝是道教兴盛的时代。把《金瓶梅》放在明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说明《金瓶梅》一书在暴露腐败的封建社会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吴晗在文章中还注意到，这个时期商人阶级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商人阶级因为海外和内地贸易的关系，他们手中存有巨额的银货，他们一方面利用农民要求银货纳税的需要，高价将其出售，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结，把商品卖给政府，收回大宗银货，如此循环剥削，资本积累的过程，商人阶级壮大了，他们日渐成为社会的新兴力量，成为农民阶级新的吸血虫。”《金瓶梅》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1940年以后，吴晗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开始有了变化。他认为国难当头，专攻“支离破碎”的考证是没有用的。当他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时，就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吴晗独特的战斗手段，就是写历史杂文。它的矛头一般都是指向国民党政府中的最高统治集团。例如1943年11月14日发表在《云南日报》的《论贪污》一文，说的是历史上无朝不有的贪污现象。但吴晗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翻翻陈帐，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再针对现状，求出对症的药石。”写历史上的贪污，是为了鞭挞现实存在的贪污。吴晗画龙点睛地指出：“最奇怪的是皇帝也有贪污，用不正当的手法收受贿赂。”“皇帝是国家元首”，而这时的国家元首“是有贪污的”。又如1944年发表在昆明《正义报》上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文。这篇文章是针对着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打

内战的政策而写的。文章一开头就宣布“历史是一面镜子”，亦即要用历史的镜子来照照现实。文章说，三百年前，当明思宗自杀以后，清兵占领北京，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大备百官，征歌选舞”。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战争而“流亡离散”，“被战争所毁灭，被饥饿瘟疫所威胁。”文章指出：“即使是禽兽也该明白当前危机的严重，然而这位皇帝还满不在乎，人生行乐耳，对酒当歌。”一些带兵的将领，则拥兵自重，勾心斗角，宁可眼看大片土地被清军占领，也不同心协力抵抗清兵。文章最后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三百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种杂文，如果不是一个出色的战士是写不出来的。

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吴晗是个坚强的民主战士。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吴晗主持了北平市民民主同盟的领导工作，和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1948年到石家庄解放区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和教导。吴晗在解放区参观访问，大受鼓舞。他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并向党中央正式提出入党要求。吴晗的历史观在这期间又有明显地进步。新中国建立后，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社会工作很多。但他对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还是作出重大的贡献的。其中，影响最大，用心最勤的是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这套小丛书，目的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他认为，对历史知识，“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有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

的要求的。我们要彻底改变文化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为此，吴晗大声疾呼：“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由于吴晗身体力行，奔走呼号，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几年之中这套小丛书就出了两百余种，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吴晗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1957年，吴晗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他更想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此后，他在十分繁忙的间隙里，写了许多历史杂文。1959年，党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浮夸风，不少干部不敢说真话。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敢说真话的精神。吴晗是研究明史的，立即响应这个号召，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和京剧，赞扬海瑞“言行一致”的“实践精神”。希望通过宣传海瑞纠正党的浮夸风，谁知这种善良的愿望，后来却成了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而遭到灭顶之灾。

在谈到吴晗的治学道路和历史观时，还应该着重谈一下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1943年，吴晗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和发泄政治上的不满，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这本书的材料掌握和科学分析都很不够。出版以后，吴晗非常不安。1948年，他决心写《朱元璋传》，目的是为了和“作废了的初

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因为“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吴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朱元璋传》初稿写出后，正值吴晗响应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来到石家庄解放区，毛泽东同志亲自阅读了《朱元璋传》，并就彭莹玉的归宿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吴晗大受鼓舞，决心把《朱元璋传》进一步改好。1954年，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吴晗又对《朱元璋传》进行改写，并打出油印稿，虚心听取意见。毛泽东同志再次就朱元璋的晚年评价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吴晗边查材料，边思考问题，断断续续，到1965年才正式出版了《朱元璋传》，这和1943年的版本已完全不一样，是一本在观点方面、史料运用和文字表达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是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朱元璋传》从开始酝酿到写出《由僧钵到皇权》，直到写出新版的《朱元璋传》，前后经过二十多年，数易其稿，从把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到对朱元璋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这个过程，也是吴晗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历史观的进步过程。有心的读者，只要把《朱元璋传》的几个版本对照一下，便可以从中得到证实。

正如彭真同志在为《吴晗传》的题词中所说的：“吴晗同志以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吴晗治学道路的转变，以及他的历史观的不断进步，是和政治上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分不开的。吴晗所走过的道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颇有启迪的。《吴晗选集》限于篇幅，但所选文章当尽可能反映吴晗治学道路和历史观的变化，借以使读者从中得到启发和思索。这是我的一点愿

望，但愿这本书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能起点参考作用。

苏双碧谨序

1987.5.于北京沙滩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序·····	苏双碧(1)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1)
胡惟庸党案考·····	(47)
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94)
《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	(110)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143)
明代之农民·····	(167)

明教与大明帝国·····	(203)
记大明通行宝钞·····	(251)
论贪污·····	(268)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274)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277)
“社会贤达”钱牧斋·····	(284)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	(304)

谈迁和《国榷》	(314)
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	(336)
论海瑞	(347)
《海瑞罢官》序	(371)
赵括和马谩	(377)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381)
论历史知识的普及	(392)
论历史人物评价	(408)
说道德	(427)
再说道德	(430)
论民族英雄	(433)
谈学术研究	(440)
论修清史	(443)
《朱元璋传》自序	(446)
吴晗著作和生平年表	王宏志(449)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要知道《金瓶梅》这部书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先考定它的产生时代。同时，要考定它的产生时代，我们不能不把一切关于《金瓶梅》的附会传说肃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对于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挨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的成就。另一方面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

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他们的根据是：

(1) 沈德符的话：说这书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这一位某先生，经过几度的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

(2) 因为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王家和严家有仇，所以王世贞写这部书的目的是(甲)报仇，(乙)讽刺。

(3) 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立论的。他们先有了一个

“苦孝说”的主观之见，以为象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不能写。

现在不管这些理由是否合理，且把他们所乐道的故事审查一下，看是王世贞作的不是。

一、《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已被一般道学家肯定为王世贞（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会使读者饶恕它的“猥亵”描写），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书？书中的对象是谁？却众说纷纭，把它归纳起来不外是：

甲、复仇说 对象（1）严世蕃

（2）唐顺之

乙、讽刺说 对象——严氏父子

为什么《金瓶梅》会和唐顺之发生关系呢？这里面又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一）清明上河图和唐荆川

《寒花盦随笔》：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

“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所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外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